

第 一 章

经 济 描 述

回忆被遗忘的经济

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家庭经济都是被遗忘的经济。尽管家庭经济是一切经济制度的核心——无论这种制度是原始的还是先进的，现代的还是中世纪的——它却一直被忽略、被忽视、被轻视，而且已经被逐出了共同的记忆。¹ 实际上，在家庭经济的存在形式和功能被真正认识 and 了解之前，它就被逐出了共同的记忆。记忆的失去不是因为家庭经济被视为微不足道或是过时（*passé*）了，而是因为它太容易被人忘记。回忆被遗忘的经济就需要有一些新概念、新数据，以及大量新的分析。不过这种努力的回报率是很高的，因为在回忆的过程中，整体经济（*Total Economy*）这一概念由含义模糊到逐渐清晰直至形成。

关于家庭部门在整体经济中的长期角色我们知道些什么？近 200 年来，存在于市场部门和家庭部门之间的动态联系的性质又如何？家庭经济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变化是如何起作用的？家庭部门的劳动者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由于对家

庭乃至整体经济的活动缺乏恰如其分的估计，所以在过去不可能精确地或者权威性地回答上述问题，因此，本项研究整理了大量的数据，以便既能回答这些较大的且更为普遍的问题，又能处理较小的有关时间、地点的具体问题。在回忆的过程中，我们对工业革命以来整体经济的形态及功能形成了明确的认识。尽管上面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但是，这里的个案研究则集中于从 18 世纪末第一批白人殖民者的到来，到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间的一个资源丰富的对蹠地——澳大利亚。当对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长期研究时，也有可能将这个对蹠地的经验扩展到全球的范围。

这是一部用数字记载的历史，它讲述了一个简单的、关于经济的来龙去脉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家庭劳动者对更大的实体，即整体经济做出了贡献。也正是这样一部数字的历史，它更关注的是经济现实而不是经济技巧的展示。有关澳大利亚经济最近的一次新的描述，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这一描述涉及了市场经济的形态、角色和功能。此后，关于澳大利亚经济历史的所有论述，都局限于 30 多年以前由 N.G. 布特林（N.G. Butlin）设计的统计框架内²，而布特林本人又是追随 T.A. 科格伦（T.A. Coghlan）这位成就非凡的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先驱的脚步的。从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战后，科格伦一直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事实上，正如本书在第七章中所述，是科格伦正式提出了市场部门与家庭部门之间的重大区别——即在“养家糊口的人”和“靠人养活的人”之间的区别——从此以后，这种划分就成为现代国民账户的基础，也正是科格伦将市场部门游离于整体经济之外，因为，尽管他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应用经济学家，但他却未能解决如何估量非市场经济活动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他太忙于开拓对现代国民账户的研究。因此，正是科格伦使得我们在真正了解家庭经济之前就丢掉了这个问题。而且，从这开始，我们基本上是跟着他走。不过没能记住家庭经济却是我们的失败，而不是科格伦，因为我们曾一度拥有他所缺乏的、测度长期的非市场经济活动的知识。³ 本项研

究是在回忆往事中对整体经济的一种长期的数量上的探索。

存在模型与逻辑模型：一种新视角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重新建立家庭生产的过程，以及家庭部门与市场部门之间长期的动态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将家庭经济的投入物即劳动、资本和土地，以及这一经济过程的产物一并加以量化。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人们用这种方法可以比单纯依赖演绎理论能对过去、现在及未来有更多的了解。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演绎理论在重新构建过去和现在的现实方面是有用的，而只是对该理论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存有疑问，似乎它作为解决问题的目的比方法更合适。对现实的揭示是一种观察的行动过程，而不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

上述问题中的一部分，在我近期写的《突破时间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提出过。在本书中，我想做的是，通过探求现实重建的性质，以及通过将其与演绎模型的建立相对比来超越方法论层面的讨论。这就要用旁征博引和比喻的方法，比喻法在这里的含义是将数量经济历史视为摄影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观察的过程。⁴

存在模型

首先，我们需要指出“归纳”法和“演绎”法之间的异同（这是从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意义上讲，因为社会科学总是二者的混合体）。很显然，这两种方法都是用创造模型来理解和解释现实的。在《突破时间的经济学》一书中，我并没有详细地探索重构现实的过程，这就可能在无意中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认为真正地重构现实是可能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这只是一种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能够加以重构的不是现实的真实的存在，我们能做的只是一个现实的经验模型，我称之为存在模型（*existential model*）——

一个说明存在的模型——它有别于逻辑模型，而后者是一种知识的架构。⁵ 一个存在模型具有许多物质现实规模递减迹象的特征——它就像一名规划人员用电脑编制的乡镇或城市规模的模型。建立一个存在模型的理由是，通过该模型的特征或结构，与过去和现在的现实世界的特征或结构之间的相似之处来描绘现实，因此，存在模型不是现实，但它符合现实的。它直观地展示出现实是什么样的。正如维特根斯坦因（Wittgenstein）在《论文（Tractatus）》中论述的那样：

- 2.12 一幅照片就是一个现实的模型。
- 2.13 照片中的对象具备反映它的照片的各个组成部分。
- 2.131 照片中的一组人是客观对象的代表。
- 2.14 构成一幅照片的是一组有确定的相互姻亲关系的人。
- 2.141 一幅照片就是一个客观事实。
- 2.15 照片里的一组人有确定的相互姻亲关系，这一事实表明，事物本身也是同样的相互姻亲关系。⁶

我们能够接受这种推论，但未必接受维特根斯坦因的论点，这种论点否认一个逻辑命题必然是它所描述的现实的一幅写照——即否认存在于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的结构的共同性。这个论断存在的问题是，维特根斯坦因从客观世界转到了语言世界。不过，他的推论对客观世界而言还有一定的意义。

在本项研究中，存在模型是从我感兴趣的、与现实的主要方面相符的、数字的累积（building blocks）中归纳出来的。这些主要方面是指家庭生产的长期过程以及家庭部门与市场部门之间的动态联系。数字符号代表家庭劳动者，或者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而且这些数字被用来勾勒现实，或者是我称为与现实相对应的时间画面。这些经济的时间画面（economic timescape）展示了重要经济变量之间的数值联系。而这种展示只是理解的开始，但是归纳法则包含一个额外的步骤，它不仅需要观察因果联系，而且需要通过用时间画面构建的存在模型来解释这些联系。这种解释包括理论

（逻辑模型）的运用和以观察为依据建立的模型，以及对模型的检验。但是，重要的是，确保被检验的存在模型，或以观察为依据的解释是用数据，而不是用一种预先的期望来检验的。对存在模型的正式的经验检验，仅仅是观测数值变量、报告我们观察的结果，以及检查（判断性检验）统计结果的性质，这样一些普遍接受的方法的运用，以便减少观察的主观性。因此，经济计量学应该作为观察过程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是观察过程的替代物。重要的是，就存在模型而言，观察在先，解释在后。但就逻辑模型而言，解释却先于观察（理论的运用），甚至认为前者可以替代后者。

在本书中我试图揭示的现实画面，并不是经济的外部的或者暂时特征的画面，而是经济变化的基本动态过程的画面之一。尽管本项研究涉及的是澳大利亚社会的主要制度，包括家庭、公司、官僚部门以及促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但这是在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进行的研究，因为在这里，它们是被作为变化的载体而不是根源。

制度是重要的。任何社会所特有的特征，都是其主要经济力量和蕴含在该社会的主要制度内部的文化价值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然而，这里应该区分制度的表面特征和它的功能性作用。这些表面特征就像一张组合得很好的照片的背景，虽然看上去令人感兴趣，不过它们的基本功能却是让我们止步不前。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制度上的差异，甚至在功能上也不尽相同，因为通常对主要经济力量的变化，从制度上做出反应的活动余地有大有小。历史上不存在社会制度发展的最理想的道路。制度在变化过程中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不如主要经济力量，比如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这些经济力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促进了经济变化。经济力量改变着社会制度，但制度并不改变经济力量。事实上，如果制度不当或者僵化——例如在前苏联社会中的那些制度——而且它们横在经济力量变化的道路上，那些制度就会被清除和被取代。正是这些主要经济力量，是我希望能通过本书中的时间画面和存在模型来予以提

示的——本书中的存在模型，重点研究的是普遍性的，而非独特的社会特征。

尽管如此，存在模型对于时间和地点而言却是特定的，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是逻辑模型永远不可能告诉我们的，即一切逻辑上的可能性，都依赖于模型特定的假设组合，这种组合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关联的。存在模型甚至能够告诉我们那些已经被理论家们完全忽略掉的，或者经济学者们不能利用逻辑模型成功地加以处理的经济问题，正如我在《突破时间的经济学》中谈到的，这些问题包括人类社会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变化的大问题，比如家庭经济，它是未被纳入主流经济思想体系之内的问题，还有诸如人口增加、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变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

经济增长是对理论局限性的一个饶有趣味的佐证。由于现实世界的变化和增长是一个包含诸多具有地区特色的变化的复杂过程，对于它的观察必须先于对它的解释。不存在从逻辑上就能推导出来，并且适用于一切情况的通用的增长进程。由于逻辑模型在做出解释之前并未进行观察，所以它就不能，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逻辑模型所能做的就是明确那些藉以产生某种结果的条件——比如，停滞、不稳定、均衡、指数增长——或者陈述关键性的假设——比如递减、不变或者递增的报酬——以及决定的结果。这不仅对主流经济理论来说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对从经济学的新进展/生物学的观点推导出来的逻辑模型也适用。相对而言，存在模型能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现实世界增长过程的内容。通过引进一系列长期的数值变量，存在模型能够说明一种经济是如何在形式、结构以及一些主要关系方面发生变化的。这种说明是解释经济增长过程的性质的先决条件。

逻辑模型

逻辑模型(logical model)是头脑构思的结果，它旨在系统地表明从现实中分离出来的各种关键变量之间可能发生的联系。逻辑

模型构思所使用的数据与现实世界的特征并不一致，它只是把一些抽象的数学符号联合在一起演绎成一个逻辑体系。逻辑模型只有在那些创造者的头脑中才是与现实相符的，尽管在尝试着将它们应用于现实的时候不能令人满意——就其解释的和预言的力量及政策的成功性而言，都是令人不满意的。逻辑模型的长处在于其精巧性和严密性，但是其弱点却在于简单化和人为化。它们无法真正认识现实世界，是因为它们并非由有形的建筑砌块建造出来的。实际上它们的方法论，就其自身而言，是自挖墙角，因为它们试图不加展示就凭空解释。一些经济模型能够深入了解现实世界的唯一原因，恐怕是由于极少数理论家所具有的伟大的直觉——例如凯恩斯（Keynes）个人敏锐的洞察力——这可能部分地弥补了他们历史观察的欠缺，但是这毕竟是很少的。当组成这个专业大军的普通经济学者们试图超越这一成就时，他们的直觉知识不足便在其理论尝试缺乏现实意义上反映出来。一个比较可靠的程序是将观察行动置于解释之前。

因此，逻辑模型是由逻辑思维的性质所驱动的，而存在模型则允许现实世界表明其本身的种种联系。相应地，存在模型使我们能够探求复杂的、意想不到的以及被遗忘了的问题。但是，这不应成为在各种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进行淘汰选择，相反地，它们彼此应和睦相处。

演绎理论

要说明研究现实的理论方法，我们只需要在本项研究给定的主题下，去拜读那本由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写的值得注意的书——《关于家庭的一篇论文（A treatise on the family）》，就足够了。这是一本比较重要的书，也是一个‘程式化’的事实、直觉和严密的逻辑思维的奇妙结合。而附在该书末尾的大量未经整理的近期（1950年以来）的统计数据像是后来又加上去的。该书对正规模型的准确性和经验主义的随意性的对比是十分出色的。当然，这

种对比分享了许多其他重要理论著作的研究成果。⁷

贝克尔是从他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开始的，即从他挑选出来的关于假设的家庭理论问题的逻辑探索入手。一开始，他就用非常一般化和含糊其词的措辞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例如，他告诉我们：“在过去 35 年中，随着生育率的陡直下降和离婚率的急剧上升，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大大提高。”⁸他对轻易观察到的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从未试图寻找答案。事实上，他承认他“主要关注的不是提高的原因”。⁹这个问题将留给其他人去研究。¹⁰基本上，他所关注的不是家庭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家庭内部决策的制定，这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家对于理论上的（而非现实中的）公司的兴趣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理论问题包括性别分工，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门当户对的配偶，生儿育女，婚嫁与离异以及非人类的家庭。正如贝克尔所说的那样：

尽管本书的重点主要在于分析发展，但大部分章节也包含了以观察为依据的事实：近期的统计数据；对特定村镇、城市和国家的历史的研究；有关穆斯林、非洲和东方社会的信息；原始社会人类的人种论。对这些事实的讨论同理论相比更缺少系统性。¹¹

事实上，这是一些零碎的事实（甚至是虚构）的杂烩，被用来不系统地说明，而不是证明他的理论观点的意义和重要性。

这种论证方法只是贝克尔的理论‘游戏’所需要的一种衬托，它的严肃性也跟那些游戏本身一样。贝克尔没有试图证明其理论游戏在现实和实证方面的重要性如何，而只是从他的模型中去掉了一些“暗示”。他还用这些未经检验的“暗示”，开发对未来的设想。¹²然而，这种主流的理论推理，并不能为预测未来提供坚实的基础，因为它不是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之中。贝克尔的“暗示”仅仅是一种推测。要陈述任何有关未来的令人信服的事，我们就需要对体制的动力进行系统地检验。贝克尔和其他演绎经济学家采用的静态经济分析方法，可能会在某个时点上，在涉及家庭内部联系方面

提出一些有趣的见解，但是这种方法在有关长期的家庭动态方面言之甚少，而在家庭与市场相互影响的动态方面则只字未提。换言之，它对于社会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是一无所知的。¹³

应用演绎理论

理论经济学从思维构造中获得经济变化动态的失败，已经使应用经济学家陷入一片未知水域的困境。应用劳动经济学家们的全家家当就是一些局部的和一般的均衡模型，但是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反映经济变化的动态模型。尽管应用经济学家利用的数据集和时间跨度也许在 15 年左右，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对当代模型采用长期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实际上，时间序列的跨度通常受观察数据的数目的支配，这些数据要满足经济计量分析的判断性检验的要求。而且，有了季度的数据，它还要探索年代久远的、逐渐消逝的事物。因而应用经济学家们没有对当前的环境取得一个有效的共识，同时，他们还冒着采用来自一段非典型时期（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以及 60 年代）的数据的风险。但是更糟糕的是，应用经济学家对这种数据的解释肯定是肤浅的，因为他们没有把这当作动态过程的一部分，当然是包含家庭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的一部分。这可以通过引证劳动经济学家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就有关已婚妇女的市场参与率变化所做的工作来说明。

自 1962 年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所做的有关女性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开拓性应用工作以来，¹⁴ 在美国，人力资本理论促成了一大批从供给方面分析的成果。¹⁵ 至于澳大利亚的例子则是格雷戈里（Gregory）等人在 1958 年提供的。¹⁶ 在他们的著作中，市场中女性参与率的变化主要是用女性和非女性的市场收入的静态结构来解释的，他们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考虑需求方面的力量或动态过程。遗憾的是，这种单方面的方法能够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中那些最大的改变做出特异性的解释——已婚妇女从家庭部门走

向市场部门的大规模转移。虽然有些解释已经描述了这种转变的特征，但是没有把它作为对于经济的技术基础（包括部门结构）变化的一种反应，而是认为这是由于制度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力量造成外因决定工资率的结果。¹⁷

在本书，特别是在第五章中已经做了一些尝试，以揭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一种较长期的观察和将复杂的变化过程形象化的尝试，以及通过集中研究整体经济而非市场部门，就有可能看到澳大利亚经济体系是由理性的决策者们推动的。在该体系内的经济变量，包括劳动力需求的性别结构（被贝克尔及其追随者完全忽视的）和女性/男性的工资比率都是外因决定的。但是这些是以后各章的主要内容，在本章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进一步思考经济的时间画面和存在模型的性质。

如现实主义摄影的数量经济史

对于观察与解释的区别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索。正如早先讨论的那样，经济学家们习惯于逻辑解释的方法，而不熟悉理解应该来自对现实的观察这种方式，所以，他们的理解是还没有得到充分解释以前的一种理解。探索通过观察来理解概念可以用曝光的方法，就是以摄影现实主义来做比喻。本项研究的题目，用最恰当的比喻体现出来就是家庭影集。

一个原型的家庭影集包含了个人和集体的照片，以及日常家庭生活、休闲活动、假日以及到乡村乃至国外的旅游探险活动的快照：这些是一代或几代人在不同时间点上拍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反映了逝去的现实的片断，这种被反映的片断就是用相机暗箱（*camera obscura*）的中性镜头把外部物质世界固定在相纸上。每一张照片本身的单独意义并不大，但是一系列相关的照片——联结为一个家庭的整体——不仅展现出家庭生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且还展

现了家庭成员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展的。家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氛围的改变反映在衣着和个人风格、住房和财产、休闲和度假活动的变化上。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可以通过成年的父母与成长中的孩子们之间的变化表现出来，在日见衰老的祖父母与步履渐稳的孙儿们甚至是重孙辈之间的变化的平衡中看出来。我们的家庭和其他家庭之间的联系的变化在这里也有所反映：形形色色的朋友和认识的人出现了，其中有些人只是偶然相聚，有的人经常来往——而后又永远地离开了。

通过翻阅一本家庭影集，那些反映现实的片断就在人们的想像中形成一幅更广阔的现实的整体画面。这个过程为人们展现出一连串栩栩如生的片断，这些片断与家庭真实生活的动态进程是一致的。它提供的一幅整体画面，展现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家庭内部关系和家庭与外部联系的变化。观察这一连串在时间上凝固的、生动地反映生活的表面现象，就是要了解有关的真实变化过程。这就是通过观察来了解的过程。这一过程应该在任何正式的说明之前。然而，完全的理解需要进行一般化（对于存在的模式化）和对于我们观察结果的检验，以保证我们的眼睛没有和我们开玩笑——也要保证镜头玻璃里面没有瑕疵。这种观念的各个方面可以见诸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关于摄影术的哲学论文。当讨论相机从生命之流中把独立的瞬间抽象出来的功能时，她说：“相机使现实变得具体而微，可以控制以及不透明”她还说：“照片的意义在于它保持了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¹⁸

这种比喻法可以用一本家庭影集和一张描绘这个家庭的油画之间的比较来进一步加以引伸。如果这位画家名副其实，他的作品在技巧上就会打动人。画家通过画面的强光部分与阴暗部分的对比，通过用微妙的暗示把这个家庭某些更隐秘的甚至是悲剧性的事物表现出来的手法，表达画家对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的感性的主观解释，而我们面对这样的画面常常会感到茫然。为了探求家庭成员之间和家庭与外部世界之间变化着的关系，画家甚至可能就同一个

主题给我们画出一组画，但是，无论是一张还是一组画，都不能把他所看到的现实向我们真实地展现出来。这些画表现的只不过是这位画家对客观现实的主观想像（thinks）。画家有选择的眼光代替了照相机中性的镜头（尽管相机显然也受控制它的摄影者的影响），因此，绘画所含的主观性的程度远远大于照片。最后要说的是，绘画的基本质量在于它对生活的静态而非动态的看法：它展现的是均衡状态中的生活画面。

上述比喻是贴切的。在数量经济史中，个人的快照就是经济投入和产出的年估计数——就像未知的现实在镜中映出的一些片断。这些片断是通过我们十分直观的方式被固定在相机的底片上的，尽管有的时候像照得太朦胧，有时太讲究技巧。由于对现实的反映是隔一段时间从无情的时间流动中抽取出来的，所以它们有的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有的则在我们的理解之中。现实世界联系的更广阔的画面——在本项研究中我称之为时间画面——是由一系列估计的年度统计数字提供的，这些数字比得上一组像镜子照出来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片断。为什么要用反映现实片断的照片而不用统计表格呢？因为照片能更直接地体现我们通过观察来理解的视觉和知识的能力，而表格则不行。而且照片比表格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所接受。照片具有普遍的吸引力，而统计表只能吸引那些具备了入门知识的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并且开始理解各种经济力量之间斗转星移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们构造了一种假设——我们的存在模型——它可以经受住正规的检验。

但是，我们不仅需要观察现实世界变化过程的方式，而且也需要对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进行富于想像力的思考。然而，这样就有一种危险。我们必须探索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了什么就如实地加以说明的方法，而不能按理论让我们去预料什么来进行解释。用演绎理论家们的观点来说明我们辛勤工作得来的数据，就会曲解现实的画面——或者借用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的话，就是“歪曲经济史”。¹⁹ 理论应该作为排除掉不相关因素的整理手段，或

者作为对我们的理由进行逻辑的检验，而不是作为观察的一种途径。我们做了巨大的努力来获得大量的数据，实际上，这样做仅仅为了说明经济学家们的简单模型的成份很小。每一个数据必须按照它们各自的事实来加以解释。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使用的经验模型或者存在模型。同时，它们应该有理论根据，而且必须是从观察到的各种关系和时间画面中归纳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计量技术应该被创造性地作为观察过程的一种辅助手段，或者是归纳法的辅助手段，而不应把它当作演绎法工作的无视现实的代替物。最终理论可能证明，它在筛选数据中的作用比它在阐释理论方面更重要，并且可以证明经济计量方法作为对观察客观性的检验手段比对逻辑性的关系的检验更有效。

如果数量经济史与摄影现实主义的习作——即记录客观现实的瞬间形象的尝试——有许多一致的地方，那么演绎理论就与抽象的绘画有许多相同之处。智慧产生的理论用数学术语来表达在高雅和简洁方面可以跟最高的艺术成就相比拟。它与复杂的、严峻的以及大量不可预知的现实世界形成明显的对比，现实世界与理论世界之间存在这种差别的起因是因为人类对二者所能实施的控制力度不同。理论世界深受理论家们艺术创造的影响，而经济和社会的现实世界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则是民族集团进行竞争的结果。这个世界还周期性地受到人类无力控制的环境和生物力量的破坏。因此，在理论的性质与现实的性质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不协调。

观察是理解的开始

演绎理论尽管提供了令人赞叹的陈列品，它还是不能向我们展示现实的真相，它向我们展示的只不过是这些理论家们对现实的想像。我们不应该被理论的技巧老练所折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的世界是极其简单的——一个静态的、二维的世界，在这种世界里，经

济变化只是与长期均衡相联系的、一些没有时间界限的概念。还因为在这些经济学家的世界里，可能会受到演绎理论家预料会遇到的情况的限制，一些正规的经济模型既漏掉了没想到的问题，也忽略了那些超出经济研究工作者个人经历的更大的问题。

经济理论在用于制定政策的目的以前，同现实的比较还做得相当不充分，一般地说，是因为简单明了的数学模型不能与复杂的、奇异的真实世界的进程相吻合。理论顶多只是在经济系统处于某种均衡状态时，以及当那些系统被充分分解成孤立的、但是其比例可以控制的经济活动时才是最优的。即使已经做了比较，并且发现这一理论也是不令人满意的，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抛弃的也只是数据而非这种理论。这是关于理论家的先解释后观察这种习惯的一笔遗产。理论家们在思考现实世界之前就被灌输了有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因果联系，而这些理论上的联系居然形成固定的概念，这是不是确实有点让人奇怪？理论是很少被人们拒绝的，它只是随着同样是未经验证的新理论的日渐流行而不再经常为人引用了。正如人类为之奋斗的其他许多领域一样，经济学家的世界也是时尚的世界。这一点集中概括了先解释后观察所造成的危险，并且要求我们对这种先后次序做出反向思维。

在本书的研究中，对于来自现实世界的的数据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书中利用大量的数据排列来描述家庭生产的性质、家庭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整体经济。

那些需要按照他们习惯的解释方式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的人，也许希望立即先读本书的第 2 部分，然后再折回来，捡起从第二章开始的故事的线头。这些关于澳大利亚整体经济的时间画面是用来建立存在模型的，这些模型提供了对观察到的变化的现实主义的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我希望能够证明，观察是理解的起点这个道理。正因为如此，本书所做的研究是对在整体经济中的家庭的一种描述，而不仅仅是一篇与之相关的论文。

注 释

1. 从长期的经济意义而言，这是绝对的，而从理论和应用方面来看，则是相对的。参考文献中包括的是后一种情况，但不包括贝克尔、明塞尔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2. 甚至布特林最后的著作——我曾经读过书的手稿——也是完全用市场术语写就的。尽管其论述范围在最后这本书中有所扩大——涉及了澳大利亚的欧洲的渊源——但是其目标和结构仍然与他在 60 年代早期所持有的极其相似。他坚持熊彼特学派关于繁荣会导致衰退的观点（以 1820~1840 年的繁荣及随后 40 年代的衰退为例），并且使用了相似的投入 / 产出方案。
3. 这并不是否定一些应用经济学家如埃斯纳（Eisner）、肯德里克（Kendrick）、墨菲（Murphy）等人的某些重要的近期著作，以及其他人对当代非市场的经济活动的估计。他们的著作将在第七章讨论。
4. 简要复述《突破时间的经济学》的“引言”部分（p.1—3）也许会有帮助：思想和现实

随意的观察表明，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抽象的观点比现实的实证描述更“可信”、更“成功”、或者更“流行”。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对解决如何运用社会科学来理解现实有一定的帮助，而且可能会阻止社会采用那些非最佳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都是了解社会中的人。抽象的理论是以假设为基础的。它假设有某一种客观的现实，这种客观现实能够加以考察，尽管其结果只是近似于现实；它能让人了解一部分；而要改造这种理论也是困难的。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人类的社会活动极其复杂又相互影响，并且非常难以仅靠观察来理解。为了使这种智力工作能够比较容易地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进行，社会中的人的主要活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被一一分离出来，以便于对它们进行研究；发展人类社会各方面的简单模型；处理来自经验

的数据的技巧也标准化了。这些抽象的模型具有许多功能：通过建立可信的因果“事实”来回避社会现实的复杂性；探索社会现实以便从表面的混乱无序中建立次序；以及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系统地提出“社会”政策。理论因此已成为帮助理解和改进当前社会现实的必要（但不是充分）的工具。

社会科学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理论应该是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观察，运用历史的和统计的手段归纳出来的；一方则认为应该在数学的帮助下用演绎方法得出理论。在这场争论中，归纳派在 19 世纪中后半期占了上风，但从那以后，演绎派通过他们抽象的、理论的、惊人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学上——开始凭着被米尔顿（Milton）所说的“盲目的热忱”冲到了前面，直至超过了归纳学派。演绎派的成功是如此地具有压倒性，以至于社会科学在对现实的态度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事实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演绎理论被误解为更倾向于现实。换句话说，在某些人看来，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比对社会中的人的直接的经验研究能更好地反映现实。例如，社会科学中的政策通常都是直接从简单的理论模型中推导出来的，很少有经验分析，几乎没有对历史的洞察。由于这个过程不仅不稳定可靠，而且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而使人类的幸福危若累卵。然而并不是只有社会科学家如此，那些决定重组人类社会（尽管他们缺乏社会科学的知识）的生态学家，同样戏剧性的把其政策建立在没有经过验证的演绎模型上。

那么，什么原因能够解释绝大部分没有经过证明的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呢？我的总的看法——仔细地应用经济学的训练方法——社会科学以事实开始吸引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者：一种是喜欢探索他们自己营造的世界——即理论学科的“游戏参加者”或历史学科的“虚构者”；另一种则偏好于探索真实世界——即“现实主义者”。自然很少有人能够在这两个极端上都有优异表现，就像英国的新古典经济学家 W.S. 杰文斯（W.S. Jevons）一样。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在这两方面都游刃有余，但大多数人都只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长。不用说，一门正常的社会科学需要两种方法同时应用：理论可以确定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是否正确，并把其他可能相关的潜在关系隔离开；而经验/历史研究在检验理论的相关性并加以改进，提出一般的因果联系，为政策建议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历史能够提出并分析那些隐藏在

经济本身背后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和那些决定经济变动的长期过程的动力有关，而正是经济的长期变动推动人类从过去走向未来。经济学家仅仅把目光集中于经济变动的大潮（大约 300 年或更长的时期）的表面的波纹，而经济学家的手段对企图分析这种动力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任何一种方法的抛弃，都只能使社会科学更加贫瘠。因此在社会科学中演绎派的胜利排斥了经验历史研究，这个事实值得引起相当大的关注。这种关注和经济学相联系，就是《突破时间的经济学》一书的中心思想。

5. “存在(existential)”这个字在此处是指其更传统的意思，即与“存在(existence)”或现实有关，而不是“出现(appearance)”之意。它和由索伦·基尔凯加德(Kierkegaard)提出并由萨特里(Sartre)发展的近代哲学流派没有联系。
6. 维特根斯泰因的《论文(Tractatus)》，p.15。
7. 例如，见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历史的章节”。由于坎宁安在其《经济史的歪曲(The perversion of economic history)》中对马歇尔的攻击，那些章节由初版时的开头部分移到了以后版本的附录中。
8. 贝克尔《论文》p.76(重点推荐)有关参考见1991年的增订版。
9. 贝克尔《论文》p.54。
10. 有关贝克尔偏好的一个有趣的阐述是其对电影《克雷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的一个脚注(p.77)。在那部影片里，达斯汀·霍夫曼饰演的角色在他的妻子背弃他之后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但却为此丢失了工作。这表明，对贝克尔而言，证据只是在阐明一个理论观点时才是需要的。阐述的目的是——而不是证明——虚构和事实一样重要。
11. 贝克尔《论文》，p.3。
12. 例如，他对“结果”的讨论使他认识到，在将来，“性别将不再表明一个人的收入和家庭活动(贝克尔《论文》)”(p.79)。性别的预测内容并没有受到质疑，只是对如何做出预测置疑。
13. 最近有一项有趣的尝试——见温斯顿的《经济活动的时间选择(Timing of economic activities)》(写于贝克尔的《论文》前，但晚于贝克尔的《时间的分配》)他的尝试是在一个“时间特定(‘time-specific’)”的框架内，用通常的静态生产理论来探讨商行和家庭，而那里的一切事情却是即刻决定的。温斯顿所关心的是“过程”和“流动”。他在关于家庭的两章中，